黃寶珣和《女作家自傳選集》

王鵬

黃寶珣，一九〇六年生，江蘇吳江人，她是南社詩人，柳亞子的小同鄉。一九二八年十月，她參加鄒韜奮主持的上海生活書店，負責處理讀者來信，從此開始進入出版界。抗戰爆發以後，從上海撤到武漢，再到重慶，她一直在韜奮身邊做秘書，並兼任生活書店文書科科長。一九四二年冬，她在桂林創辦了耕耘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書是呂振羽撰寫的《古代史》，作者當時在延安。在女作家謝冰瑩的幫助下，黃寶珣策劃了《女作家自傳選集》一書。她在桂林時就開始組稿，後到重慶繼續組稿和編輯，一九四五年重慶耕耘出版社出版了《女作家自傳選集》（**見圖**）。這部書包含了她付出的心血和勞動。新中國成立以後，她來到北京，一直在出版和發行部門工作，一九九六年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歲。

▲何香凝的題詞手跡

◀《女作家自傳選集》

在《女作家自傳選集》（全書二百四十三頁）中，收錄了九位女作家各自撰寫的「自傳」：子岡的《自愧與自勉》、安娥的《我怎樣離開的母親》、白薇的《跳關記》、林北麗的《二十七年的旅程》、彭慧的《簡單的自傳》、葉仲寅的《我的自傳》、褚問鵑的《生命的印痕》、趙清閣的《也算自傳》、謝冰瑩的《平凡的半生》。原本黃寶珣還約請何香凝撰寫「自傳」，後她於一九四四年六月爲這本書題了詞：「耕耘出版社函命余追述奮鬥成功經過，撫今追昔，不願多述，忍痛奉題拙詩以報命：歷史再虛談，愧看先烈血，國破又民飢，羞在人間列。」黃寶珣把何香凝的題詞手跡（**見圖**）放在書前，增加了書的「含金量」。

在《女作家自傳選集》中的女作家，有許多已被當今的讀者遺忘，她們所撰寫的「自傳」，講述了她們是如何走上文學和寫作之路，爲中國文學史研究留下了難得而寶貴的史料。例如子岡（一九一四——一九八八年）在「自傳」中，就講述了她開始從事新聞寫作的經歷。她寫道：「我沒有讀過新聞學ABC，而也羞於去問編輯怎樣開始我的工作，憑着我的膽量，憑着我讀過的一些新聞紀事，憑着我的一些狹小的社會關係，我開始訪個人，訪團體，訪一些新聞事端的始末。……那剛剛是抗戰的第二年，武漢成為保衛中國的心臟，救國高潮在這兒滲透到了頂點。那麼多的救國團體，那麼多的與抗戰有關的集會，那麼多的凸出於社會間斷的令人歌頌的人們。我接近的是傷病，是難民，是終日奔走演說、貼壁報、教識字的熱情的男女青年。傷兵之母周蔣鑒在那時認識了，由前方或淪陷區來的游擊隊領袖認識了，邊區省份的救國工作者認識了，對了，還有孩子劇團新安旅行團的小朋友們與我也最熟稔。之後，引起漫天煙火的大轟炸開始，敵機過後，許多新聞記者冒了溽暑奔走於武昌漢陽，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我們最初被那血淋淋的屠殺所感受的印象是與之後幾年司空見慣不同的，因之或許流於筆墨之間的憤怒也要真切，熱烈一點。是的，那時候我以我的熱情，與初入新聞界的新鮮感覺，寫得比較多，在現在想來，也許是比較濫。我沒有估計篇幅，沒有估計到讀者可願意看，每天計劃了採訪日程，跑了回來伏案就寫。我自己溶化在救國熱情裡，學生群，工人區，傷兵醫院裡，到處亂竄。」這就是子岡初當記者的經歷，也是抗戰初期大後方支援前線、抗戰救亡的眞實寫照。

季羨林的幽默

戴永夏

剛剛去世的國學大師季羨林教授，不但學貫中西，著作等身，而且也是一位十分幽默的智者。他的幽默，既體現在作品中，也表現在爲人上。幽默使他的作品更富情趣，也使他的人生更具光彩。

季羨林的幽默，更多地出現在他飽經滄桑、看淡紅塵的晚年。即使回憶文革時那段被關進「牛棚」慘遭迫害、備受凌辱的非人生活，他仍不乏辛酸的幽默。上世紀九十年代他寫的《牛棚雜憶》中，就有許多地方是用諷刺幽默的筆觸來寫荒唐、醜陋的往事。如書中寫建「牛棚」：「我們親手把牛棚建成了，我們被『請君入甕』了。牛棚裡面也是有生活的。有一些文學家不是宣傳過『到處有生活』嗎？」接着他又寫了「四句歪詩」：「大院建成，乾坤底定。言順名正，天下太平。」寫被批鬥，他說：「今年我有資格了，可以被當『鬼』來鬥了。」「回到黑幫大院以後，脫下襯衣，才發現自己背上畫了一個大王八，衣襟被捆了起來，綁上一根帶葉的柳條。根據我的考證，這大概就算是狗尾巴吧。平常像閻羅王殿一樣的黑幫大院，現在卻顯得異常寧靜、清爽，簡直有點可愛了。」這種含淚的微笑，隱而不露的嘲諷，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文革」的黑暗，比聲嘶力竭的控訴更爲有力。

晚年的季羨林，身處太平盛世，可謂生活在一片讚譽和掌聲之中。生活條件好了，榮譽多了，地位高了，可他仍然保持着清醒的頭腦，不被榮譽的光環所迷。他的本色的幽默也像泉水一樣，不時地從他的作品和言談舉止中湧流出來，凝結成一朵朵智慧之花。

季老晚年的幽默，常顯示出他做人的低調、平淡。如對人們加給他的「國學大師」稱號，他就不認同。他說：「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於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竟獨佔『國學大師』的尊號，豈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劇女角詞）！我連『國學小師』都不夠，遑論『大師』！」（季羨林：《病榻雜記》）對外界送給他的其他榮譽稱號，他也不願接受：「近幾年來，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一片虛名，套在了我的頭上，成了一圈光環，給我招惹來了剪不斷理還亂的麻煩。這個會長，那個主編，這個顧問，那個理事，紛至遝來，究竟有多少這樣的紙冠，我自己實在無法弄清，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季羨林：《大覺明慧茶院品茗錄》）這些肺腑之言，都充分表現出這位國學大師的務實和謙虛精神。

自己虛懷若谷，對別人雍容大度，但對社會上一些醜惡的東西，季老卻嫉之如仇。他的幽默武器，有時直指社會上的不良風氣：「我曾問過自己一個問題，如果眞有那麼一個造物主，要加恩於我，讓我下一輩子還轉生爲人，我是不是還走今生走的這一條路？經過了一些思慮，我的回答是：還要走這一條路。但是有一個附帶條件：讓我的臉皮厚一點，讓我的心黑一點，讓我考慮自己的利益多一點，讓我自知之明少一點。」（季羨林：《我這一生》）季老這看似消極的反語幽默，發人深思，催人猛醒，讓人讀後，在會心一笑中產生強烈共鳴。

也有一些幽默，是季老的「即興發揮」，流露出一個寬厚長者對人生和自己的善意調侃，讓人從忍俊不禁中受到啓迪。如有一次，季老的護工岳愛英用輪椅推他時，方向不是平常的順時針，而是逆時針方向。季老說：「你怎麼這麼轉啊。我本來就糊塗，這樣我不是更糊塗了嗎？」護工跟季老打趣說：「不是難得糊塗嗎？」季老自嘲說：「我現在糊塗也不難得了。」（蔡德貴：《先生口述史再也聽不到了》）

綜觀季老的幽默，絕不是一般的做秀搞笑，而是大智慧的閃光，是他「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的坦蕩人生的寫照。正如評論家菊影所言：「季老的幽默，是他人格山岩上開出的小花，一叢叢，一簇簇，雖不是漫山遍野，但足以顯露生機與活潑。這是一種能給人力量與溫暖感的幽默。」

宋碑《重修天慶觀記》與三佛齊

朱育友

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外交通要道。其南線，在歷史上爲中國與南海諸國政治、經濟、文化交流作出過重要貢獻。一九九〇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部署對此路沿海港口考察以來、與此路有關的文化遺產重新引人關注。從報道獲悉，二〇〇九年四月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無錫論壇上，廣州等五城市已被納入此路文化「申遺」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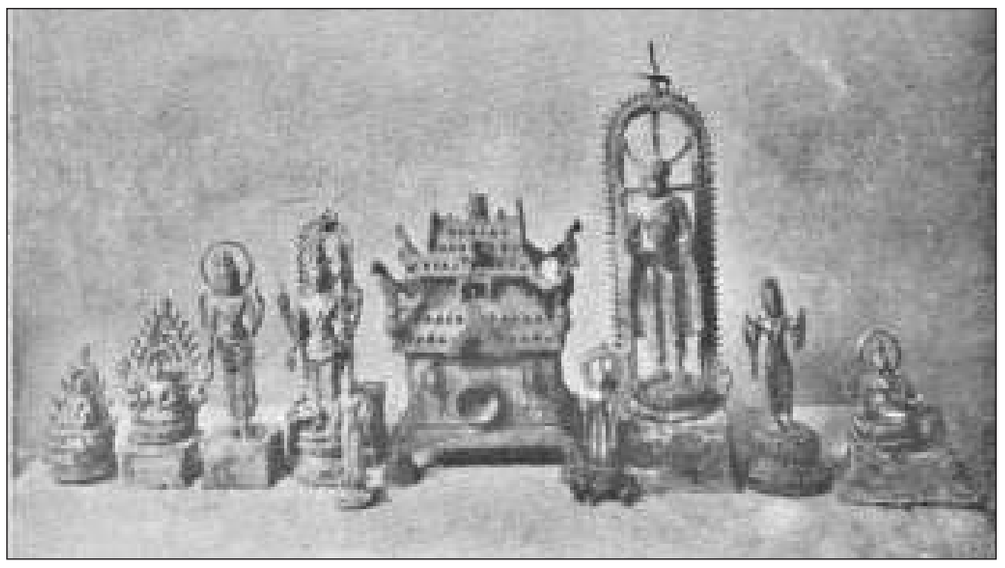
廣州開闢海上絲綢之路南線交通歷史長、規模大，通過此古道與南海諸國交往頻繁，影響深遠。現存有關古跡文物也多，宋碑《重修天慶觀記》也是其中之一。《重修天慶觀記》碑文早見地方文獻，而碑石是一九四九年之後始發現於廣州海珠北路祝壽巷原天慶觀遺址的。發現時碑石已破損，後經有關部門修復移置越秀山。該碑刻於宋神宗元豐二年（一〇七九年）。撰文者是原天慶觀道士何德順。碑文詳述三佛齊國大首領地華迦羅捐資重修天慶觀的緣由。全文六百多字，繁冗而乏文采。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天下郡縣利病書》根據文獻，刪其繁蕪，存其概要。云：「治平中，地華迦羅遣使至羅羅入貢，遇大風，船幾覆。至羅羅禱於天，有老翁見雲端，風浪息。時值儂寇毀廣州天慶觀，老君像在瓦礫中。至羅羅睹之，即向所見者也。及還，以告地華迦羅，即遣離思沙文詣廣，購材鳩工重建……。」

碑文經顧炎武刪削，簡潔精煉。但原文中一些有關史實也被刪節。如原文云：「五羊瀕巨浸，接諸蕃，飛航雲集」，反映宋代海上絲綢之路交通輻輳，促進主要港口廣州之外貿繁榮。又如原文描寫修復後之天慶觀「規模宏備，煥若洞府」，但觀中之殿堂廳室樓台，並非一次建成，而是歷時十餘年，地華迦羅所屬蕃舶多次來廣州時逐漸擴建而成。這說明地華迦羅之蕃舶並非偶爾一至廣州。而是常川往來。碑文還詳述地華迦羅在南海、清遠兩縣購置地產，以租息供天慶觀常費。地華迦羅如此虔誠信奉李老君，原因是「自修觀以來，發船舶跨浩濤之險，常得安濟，無昔日之驚危，足驗眞靈之護佑也。若乃繼發巨舟，獲上清之美報固可量也。」顯示地華迦羅還計劃繼發巨舟，擴大貿易。以上被顧炎武刪節之文字實皆有助於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的交通、貿易、邦交、宗教等史實。

三佛齊是海上絲綢之路南線之重要港口，也是古代南海強國。中國載籍中記述該國的資料甚多，近現代中外學者所發表的研究該國論文也不少，但關於該國歷史沿革的觀點頗有出入。一般認爲該國地在今之蘇門答臘，初稱斤陀利國，在中國南北朝時代（四二〇——五八九年）已多次入貢中國。唐高宗永徽元年（六五〇年）被印度裔的山帝王朝（或譯岳帝王朝）所吞併，稱室利佛逝國。此國地當海上絲綢之路南線要衝，國際貿易發達，而且是南海佛教中心，爲東來西往僧侶所常經之路。該國也屢次朝貢唐朝，唐朝僧人路經該國轉往印度者也獲得善待。如近現代研究者所常提及的初唐戒律僧義淨，要往印度學習戒律，由廣州乘商船到該國，學習梵語，停留半年，得其國王資助，並被協助前往末羅瑜，然後渡洋至印度。義淨在印度學習十年，又回室利佛逝。前來廣州購買紙筆，並聘請助手貞固等四人，前往該國抄寫經典，六年之後始回中國。唐朝晚期至宋朝時期，室利佛逝改號三佛齊。改號之原因，研究者說法不一。有人說是同名異譯，有人說三佛齊是室利佛逝的僞讀。張禮千譯溫士德《印度化時代之南海》則斷言改號是改朝換代，明確說：「迨至八九〇年室利佛逝爲莊嚴山帝所滅，嗣後遂稱三佛齊。」

相當於宋朝時代之三佛齊國勢強盛，有十五個屬國，勢力範圍包括馬來半島和巽他群島的大部分地區，控制了馬六甲海峽門戶。宋人周去非《嶺外代答》說：「正南諸國，三佛齊其都會也。」又說：「三佛齊在南海之中，諸蕃海道之要衝也。東自闍婆諸國，西至大食、故臨諸國，無不由其境而入中國者」

三佛齊與中國關係密切而態度友善。兩國民間貿易之帆檣交接，《重修天慶觀記》已有反映。三佛齊官方對宋朝的朝貢也絡繹不絕。宋朝對該國的回賜極優厚。如神宗元豐二年（一〇七九年）回賜錢六萬四千緡、白銀一萬五百兩。三佛齊貢使多獲得宋朝封贈官爵。如捐資重修天慶觀之三佛齊大首領地華迦羅，在碑文中署銜「保順慕化大將軍」便是其人於宋神宗熙寧十年（一〇七七年）作爲三佛齊使者入貢時被神宗封贈的。有的三佛齊使者還受到宋朝的特殊禮遇。如宋眞宗東封泰山，特邀該國使節李眉地等觀禮朝覲台。三佛齊雖然是印度化國家，但也重視中國文化。他們在國內建造佛寺爲宋眞宗祝壽，特請眞宗賜給寺名和賜給鑄鐘。他們國內高級僧侶用以象徵身份的紫衣和度牒，也請求宋朝賜予。他們雖然使用梵文，但也用中國字，凡入貢國書，皆用中文。括《宋史》載，該國有一國王之女，還親筆寫中文信，附禮物贈廣州市舶司官員。中國的一些典章制度和曆法知識都被引進。中國銅錢也可在其國內流通。宋朝自始至終，皆與三佛齊保持友好往來公平貿易。海上絲綢之路南線衆多古國，如注輦、闍婆、占城、眞臘、渤泥等國，遠至天竺、大食，也皆與宋朝一直保持和善邦交和公平貿易。各國皆蒙其利，宋朝不但由於外貿興盛，促使絲綢、陶瓷、冶金工業發展，而且每年市舶司收入達二百萬貫，成爲國家重要財政來源。在研究海上絲綢之路文化時，宋朝取得成功的外交、貿易政策，是值得總結的。



一九三九年出土於西婆羅州坤甸的室利佛逝佛像及香爐（此圖取自《南洋學報》一九四〇年第二卷第二輯）

想起艾青的一句話

馬承鈞

當今世界，雷人雷語、出格舉動屢見不鮮，連一些「文化名人」也不甘落後。今年五月一日，內地票房紅火的《南京！南京！》劇組與記者共進午餐時，導演陸川突然「報料」稱：中國電影集團公司董事長韓三平對《南京！南京！》大爲看好，影片公映前就口出豪言：「如果票房超過一億，我就去黃浦江裸奔！」這韓三平還對陸川說：「假如票房突破一點五億，你陸川也要跟着去裸奔。」

好傢伙，堂堂中國電影集團公司董事長，居然得意忘形地不要起碼的做人底線和羞恥感，因爲票房獲利便聲稱要光身上街裸奔，實在令國人大跌眼鏡，我敢說，他會讓放浪形骸、醉迷山林的古代隱士望塵莫及！而他可曾想到：我國法律和道德准許麼？沿途的公衆答應麼？我相信，只要他敢赤身裸體上街一奔，立即會有人衝上去將其摁倒在地，裹上廣告旗扭送警方或精神病院。

於是想起詩人艾青說過的一句話：「現在有些青年人急於成名。要成名是很容易的，一是罵名人，二是脫了褲子在長安街跑一跑，就見效了……」艾老此言幽默而深刻，很有針對性，令人拍案叫絕。想必那位董事長應該不會太年輕了，也不必「急於成名」的，竟然聲稱要「裸奔」，實在令人百思不解。假如他不是忘記了國情與傳統，不是失去了羞恥感和人格底線，那只能解釋爲他因一時成功而得意忘形、利令智昏了！如果他兌現「承諾」的話，敢問這是勇敢的「裸奔」抑或瘋狂的「裸奔」？是光榮的「裸奔」還是無恥的「裸奔」？假如他此舉純屬爲影片造勢的噱頭和「忽悠」觀衆的眼球，那更是將無恥當時尚、視惡搞爲高雅了！

「裸奔」是流行於西方的另類「行爲藝術」，裸奔者大多出於政治的、感情的、體育的或者金錢的目的，也有的聲稱爲「保護環境」或「爲藝術獻身」，他們以驚世駭俗的赤裸之身表達自己的反抗、悲憫與主張，用以引人眼球、博得同情，達到「造勢」的目的，其初衷似也可以理解。但即使在觀念開放的西方，「裸奔」也屬於傷風敗俗的出格之舉，被大衆所詬病，警方也會制止的。而某些心懷覬覦的裸奔者，更墮落爲邪惡與無恥的幫兇。

日前，一組名爲《復旦學生裸奔慶祝畢業》的照片自搜狐網映入眼簾。照片中兩名復旦大學畢業男生赤身裸體在燈光下擺出各種姿勢，並打出標語「最後的坦誠」。因大學畢業而興奮得公然表演「裸奔」，筆者不禁要爲這樣的「天之驕子」深感臉紅，此舉既無任何社會意義更遑論藝術價值，只不過是其個人猥瑣情緒的譁衆取寵無聊宣洩罷了。他們卻還自詡此舉是「最後的坦誠」，敢問「坦誠」什麼？何謂「坦誠」？難道赤身裸體就是所謂「坦誠」麼？「一葉知秋」，我從這組「雷人照片」上讀到的是應試教育帶來的人格扭曲和某些青年心態的病變，他們眞的應該好生讀一讀、想一想艾青的名言了。

蘇軾識人

易俊傑

蘇軾一生好遊，常在遊覽大好河山中陶冶性情，也在旅遊中識人辨友。

有一次，蘇軾與章惇結伴出遊，路經黑水谷時碰到一條深澗，澗上搭有一塊很窄的木板，下臨湍流翻滾，兩側是巨石壁立。章惇提議從木板上過去，在對面的岩石上題字，表示「到此一遊」。蘇軾一看險地，表示自己不願去冒險。章惇微微一笑，坦然走過那極窄的木板，又把長袍塞在腰間，抓住一條懸垂的青藤，盪到巨石上，寫下「蘇軾章惇遊此」六個大字，而後又攀藤走上木板回來。

章惇一臉得意，等待蘇軾對他這種大膽勇敢精神的稱讚。蘇軾則拍拍他的肩頭慨嘆道：「總有一天，你老兄會殺人不眨眼的。」章惇沒想到蘇軾居然會這樣「誇」自己，不禁十分驚訝道：「爲什麼呀？」蘇軾說：「把自己生命不當回事的人，自然不會把別人的生命當一回事。」

後來，宋哲宗趙煦親政，章惇官拜相位，便對其政敵包括蘇軾在內的三十幾位在元佑年間的大臣進行迫害，人數之多，前所未有。他還向宋哲宗提出，下詔將早已去世的司馬光、呂公著掘墓毀屍，連死人也不放過。幸有人說：「如此，只將爲本朝添污。」司馬光等才免去戮屍之辱。

還有一次，蘇軾應約與朋友謝景溫出遊。一路上，兩人且說且笑，相談甚歡。突然一個黑影從樹上跌落下來，兩人被嚇了一跳，連忙收住腳步，定睛看時，原來是隻受傷的小鳥。蘇軾湊過去，剛想將鳥撿起來，謝景溫卻大步走了上來，抬腳便將鳥踢到一旁，說：「兄台何必爲了一隻驚嚇了我們的小鳥耗費心思，我們繼續朝前走吧。」蘇軾面色凝重，一言不發，全然沒了遊覽的興趣。

不一會，兩人來到一座獨木橋前，橋對面是一簾瀑布，瀑布下面便是深潭，橋下急流奔湍，景色奇美壯觀，卻也極險。蘇軾見橋極窄，心膽俱寒，不敢過去。謝景溫見此情狀，嘲笑蘇軾膽小，拉起他的手就向橋上邁。蘇軾本能地抽回了手，謝景溫大笑着信步走了過去，留下蘇軾在橋邊發呆。

旅遊回來之後，蘇軾便與謝景溫絕交，從此不再往來。

有朋友問蘇軾爲何如此，蘇軾語出驚人，他說：「一個人既然連自己的生命都不愛惜，又怎麼可能去愛惜別人的生命呢？輕賤生命之人，不可爲友。」接着，蘇軾又預言：「如果此人得勢，一定不會把別人的生命放在眼裡。這樣的人心狠手辣，爲達目的，連命都能不要，還有什麼事情做不出來，很有可能做出損人利己禍國殃民的事情來。」朋友們聽了，都只笑笑，搖搖頭，以爲他這是小題大做，危言聳聽，沒有一個人相信他的話。多年後，謝景溫成爲一代權臣，殺戮無數，連蘇軾也險遭毒手。謝景溫成了北宋有名奸臣小臣，時人才皆讚蘇軾能辨友識人。

西安問吃

公孫欠諛

剛剛去世的國學大師季羨林教授，不但學貫中西，著作等身，而且也是一位十分幽默的智者。他的幽默，既體現在作品中，也表現在爲人上。幽默使他的作品更富情趣，也使他的人生更具光彩。

季羨林的幽默，更多地出現在他飽經滄桑、看淡紅塵的晚年。即使回憶文革時那段被關進「牛棚」慘遭迫害、備受凌辱的非人生活，他仍不乏辛酸的幽默。上世紀九十年代他寫的《牛棚雜憶》中，就有許多地方是用諷刺幽默的筆觸來寫荒唐、醜陋的往事。如書中寫建「牛棚」：「我們親手把牛棚建成了，我們被『請君入甕』了。牛棚裡面也是有生活的。有一些文學家不是宣傳過『到處有生活』嗎？」接着他又寫了「四句歪詩」：「大院建成，乾坤底定。言順名正，天下太平。」寫被批鬥，他說：「今年我有資格了，可以被當『鬼』來鬥了。」「回到黑幫大院以後，脫下襯衣，才發現自己背上畫了一個大王八，衣襟被捆了起來，綁上一根帶葉的柳條。根據我的考證，這大概就算是狗尾巴吧。平常像閻羅王殿一樣的黑幫大院，現在卻顯得異常寧靜、清爽，簡直有點可愛了。」這種含淚的微笑，隱而不露的嘲諷，毫不留情地揭露了「文革」的黑暗，比聲嘶力竭的控訴更爲有力。

晚年的季羨林，身處太平盛世，可謂生活在一片讚譽和掌聲之中。生活條件好了，榮譽多了，地位高了，可他仍然保持着清醒的頭腦，不被榮譽的光環所迷。他的本色的幽默也像泉水一樣，不時地從他的作品和言談舉止中湧流出來，凝結成一朵朵智慧之花。

季老晚年的幽默，常顯示出他做人的低調、平淡。如對人們加給他的「國學大師」稱號，他就不認同。他說：「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於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竟獨佔『國學大師』的尊號，豈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劇女角詞）！我連『國學小師』都不夠，遑論『大師』！」（季羨林：《病榻雜記》）對外界送給他的其他榮譽稱號，他也不願接受：「近幾年來，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一片虛名，套在了我的頭上，成了一圈光環，給我招惹來了剪不斷理還亂的麻煩。這個會長，那個主編，這個顧問，那個理事，紛至遝來，究竟有多少這樣的紙冠，我自己實在無法弄清，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季羨林：《大覺明慧茶院品茗錄》）這些肺腑之言，都充分表現出這位國學大師的務實和謙虛精神。

自己虛懷若谷，對別人雍容大度，但對社會上一些醜惡的東西，季老卻嫉之如仇。他的幽默武器，有時直指社會上的不良風氣：「我曾問過自己一個問題，如果眞有那麼一個造物主，要加恩於我，讓我下一輩子還轉生爲人，我是不是還走今生走的這一條路？經過了一些思慮，我的回答是：還要走這一條路。但是有一個附帶條件：讓我的臉皮厚一點，讓我的心黑一點，讓我考慮自己的利益多一點，讓我自知之明少一點。」（季羨林：《我這一生》）季老這看似消極的反語幽默，發人深思，催人猛醒，讓人讀後，在會心一笑中產生強烈共鳴。

也有一些幽默，是季老的「即興發揮」，流露出一個寬厚長者對人生和自己的善意調侃，讓人從忍俊不禁中受到啓迪。如有一次，季老的護工岳愛英用輪椅推他時，方向不是平常的順時針，而是逆時針方向。季老說：「你怎麼這麼轉啊。我本來就糊塗，這樣我不是更糊塗了嗎？」護工跟季老打趣說：「不是難得糊塗嗎？」季老自嘲說：「我現在糊塗也不難得了。」（蔡德貴：《先生口述史再也聽不到了》）

綜觀季老的幽默，絕不是一般的做秀搞笑，而是大智慧的閃光，是他「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的坦蕩人生的寫照。正如評論家菊影所言：「季老的幽默，是他人格山岩上開出的小花，一叢叢，一簇簇，雖不是漫山遍野，但足以顯露生機與活潑。這是一種能給人力量與溫暖感的幽默。」

西安問吃

公孫欠諛

對西安的印象完全來自於走馬觀花，看古泥人皇帝墳妃子洗澡盆，對西安幾乎還沒有形成什麼印象，就到了要離開的時間。不過在百忙之中，始終沒有忘了尋點好吃的。我一向認爲歷史上曾經富足、繁華、一度成爲某個中心的地方少不了有好吃的東西，例如天府之國成都，人傑地靈的蘇杭，還有百業興旺的天津，當然還有十三朝古都西安。歷史這個東西是需要時間的，文化這個東西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形成靠的是積累、豐富、凝聚、傳承，美食也一樣。

在到西安之前，有經驗的朋友介紹，老孫家的羊肉泡饃和德發長的餃子宴是一定要去吃的。

先去吃羊肉泡饃，導遊給我們推薦的是另外一家，說也是老字號，條件不錯，還可以自己掰饃，可以親自體會一回操作，但因爲有老孫家先入爲主，我們婉言拒絕了，司機把我們拉到老孫家西五路店，當時不知道這是哪裡，只記得街對面是「革命公園」。一進門，就看見很多大腕的照片，有政治名人，還有問題明星，有外國人，也有中國人，都在這兒吃過饃，並拍照留念，可見此處名氣有多大。老孫家始創於清光緒年間，以經營牛羊肉泡饃爲主，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據說「西安事變」發生前，張學良、楊虎城還曾用老孫家泡饃招待蔣介石，請他吃饃，完了以後就把他抓了。

「到西安看兵馬俑，吃老孫家牛羊肉泡饃。」這句話是老孫家的一名小夥子服務員說的，因爲我們是第一次到西安，也是第一次吃羊肉泡饃，小夥子很熱情地爲我們作了介紹，得知我們是雲南人，小夥子特意問我們自己有沒有帶茶葉，我們有些不解，後來在喝了他們的茶以後才知道，那茶水黃、渾、澀，簡直就沒法入口。不過菜品不錯，我們吃得很盡興，盡量吃些名特品種，牛羊肉的鮮香滿嘴跑，就連平時不太喜歡牛羊肉的同事都覺得滿意了，價格也不高，平均一人也就五十多塊錢。如果下次到西安應該還會再去，不過我會自己帶茶葉。

「到西安，世界奇跡兵馬俑不可不看，千古風味餃子宴不可不嘗。」這是德發長的服務員說的，我們一聽就笑了，頭一天在老孫家就聽過類似的話，因爲有朋友的推薦在先，我們也相信這話沒有誇張。餃子宴是按人頭收費的，餃子也是按人頭上的，品種多，花樣多，很好看，不過吃起來也一般，價格偏高，但因爲外地人到西安，兵馬俑看了，與之齊名的餃子宴不吃，多少有些遺憾，出門在外，沒考慮錢的問題，出門人一般不差錢，窮家富路。克林頓訪華時下了兵馬俑坑，近距離接觸二千多年前的瑰寶，到德發長「看」了餃子宴，爲什麼說看呢？因爲他一個餃子也沒有吃，對着工藝品一樣的餃子讚賞了一番就溜了，不得不佩服美國佬的精明，雖說他吃餃子也不開錢，但他還是不吃。當地人在這裡一般都吃普通的餃子，實惠、好吃、簡單，這也是多年來悟出的道理。

雲南有十八怪，陝西也有十大怪，第一怪就是麵條像褲帶，陝西人經常說「油潑辣子biangbiang麵。」這個「biangbiang麵」還有個傳說，「biang」字在漢字裡找不到，陝西人在傳說中給它規範了一下：「一點飛上大，黃河兩邊彎；八字大張口，言字往裡走，左一扭，右一扭；西一長，東一長，中間加個馬大王；心字底，月字旁，留個勾搭掛麻糖；推了車車走咸陽。」在西安的幾天裡，我們也幾次吃了biangbiang麵，「油潑辣子」味道和雲南很相似，只是麵要寬得多。因爲時間太短，西安好吃的太多，鏡糕、炒米、牛肉灌湯包、平娃烤肉、韭餅、盛家涼皮、定家小酥肉、穆薩砂鍋、樊記肉夾饃等等等等，要全部吃一遍，估計半年也吃不過來，別說三天了。